第一章　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的束缚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在形势驱使下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始终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和对改变乾坤的世界革命的信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双方奉行的出自不同利益的政策又不断地把他们引向冲突和恼怒。

早在 20 年代，双方之间就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自 1935 年开始，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他在冲突中的实力显著加强，并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进程。这一进程直到战争行将结束时才完成。对于本书的主题来说，1935—1945 年这段时期作为前史比 1935 年以前的时期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所作的历史回顾将集中在这段时期。至于 1921 年至 1935 年这段时期的发展，只作为本章的第一节，作一些粗略地探讨。①

① 1921 年至 1935 年期间的文献资料太多，因此不可能每处都摘引全文。作者在以下段落中只以少量 的提示来引证它的论述。自 80 年代以来，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时期的出版物、新的资料，其中也包括档案文件。例如：郭恒钰、洛伊特纳、费尔伯、季塔连科、安德逊、格卢宁、格里戈里耶夫编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一卷，1920—1925 年，1994 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德文版由郭恒钰、洛伊特纳、费尔伯、季塔连科、安德逊、格卢宁、格里戈里耶夫编辑，1996 年在帕德堡／慕尼黑／维也纳／苏黎士出版）季塔连科、洛伊特纳、安德森、格鲁宁、格里戈耶夫编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文件集，第二卷，1926—1927 年，莫斯科 1996 年出版；《周恩来年谱 1898—1949》，北京 1990 年出版；《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第一、二卷，1993 年北京出版；《刘少奇年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在共产国际牵制下的中共（1921—1935）

只有当人们不仅从苏联对华政策，而是超越这个范围，从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去观察，人们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在 20 年代的上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个偏离国际主义路线、转向俄罗斯民族主义路线的变化。1927 年斯大林粗俗地、诡辩地把这一过程的结果归结为一句话：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①

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逐步变成了向其他共产党转达莫斯科政策的传送带。自 1920 年起，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都要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约束。②按照章程，共产国际有权在任何时候介入各国党的事务。

但是，所有重要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并不是共产国际自己作出的，而是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中作出的。③自 1922

1898—1949》第一卷，1996 年北京出版；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 年上海出版；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1992 年北京出版；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两卷，1989 年北京出版（在第二卷 339—372 页附有 1979—1987 年发表的大量参考文献目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北京出版（限国内发行）；向青（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1985 年上海出版；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以下简称：《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限国内发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 1925—1927》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内部发行）。

①斯大林 1927 年 8 月 1 日讲话，见《斯大林全集》1954 年中文版第 10 卷第 47 页。

②参见 1920 年 7 月至 8 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 3 条和章程的总则，见诺劳：《共产国际》第 311 页和 318 页。

③该党在 1918—1925 年称俄国共产党（布），1925—1952 年称苏联共产党（布），1952 年以后改称苏联共产党。

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日益明显地代表苏联的利益。布哈林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捍卫苏维埃国家。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提出，各“支部”有义务考虑俄国共产党的经验。1925—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最终变成了斯大林惩戒外国共产党、使其贯彻苏联利益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张国焘于1928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国际不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而已发展成“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①

在中国，莫斯科从1919年起就开始谋求俄罗斯民族利益，它与沙俄扩张主义是相连接的。这方面的一个标志就是：当时的苏联政府撤回了曾作出的允诺，拒绝无偿地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② 苏联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它要维护或重新取得俄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传统影响。三年后，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张作霖向孙逸仙谈了他对苏联对华态度的印象。他说，莫斯科在中国奉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尽管他们说要完全相信他们的友谊等等，但就是不归还中东铁路和蒙古。③ 从苏联领导集团在其对华政策中试图继承沙皇俄国的遗产这个事实中，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在随后的时期里感到心情沉重，从军阀到国民党，直到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领导者，尽管他们对世界革命的信仰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作为中国的爱国者都因此而感到很大的压力。这一点特别符合毛泽东④。

自1922年起，对华政策的一切事务都明显地操纵在斯大林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中文版，第2卷第445页。关于这一段落可参见京特·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科隆1959年出版，第45—91页，特别是82和90页。

② 详细情况参见迪特·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第24—27页。

③参见鲍罗廷1925年1月24日的书面报告中关于1924年12月5日张作霖与孙逸仙的谈话，引自郭恒钰等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96年德文版第1卷第612页。

④参见 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161—168。

的手中。[①] 1928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也证实：在所有关系到中国的事务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②] 因此，在论及 1922 年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时，混杂地使用“苏联”、“苏联领导集团”、“共产国际”、“莫斯科”、“斯大林”等用语都是合理的，在本书中也是如此。共产国际曾对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早在 20 年代，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这首先是因为当时斯大林把国民党看做是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伙伴。直至 40 年代末，斯大林原则上奉行的就是这一战略。[③] 它来自这样一个看法：国民党作为中国最强大的进步政治力量，似乎最有可能战胜反动军阀，统一中国，把所有外国影响（不包括苏联）排除出中国，从而无意识地为共产主义接管政权作好准备，即由苏联领导下的中共来实现政权的接管。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夺取政权，但他们在莫斯科的心目中，由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薄弱，而不占据重要的角色。直到 1948 年底，斯大林才不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

1922 年，当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同盟时，紧张关系开始出现。这一结盟在 1923—1927 之间是作为苏联军事援助的基础而提出的，而这一援助实际上只有利于国民党。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在广东以一种政变的方式极大地削弱了共产党人和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军事顾问的影响，但共产国际无视这一切，继续与蒋结盟。当上海已有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对工会组

①当时的外交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在他致斯大林的信中对斯大林掌管对华政策表示满意。这一情况是作者的俄罗斯同行康斯坦丁·舍维廖夫从《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查阅契切林的书信中获悉的。

② 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24 页。

③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对此有明确的陈述，参阅 Fisher, Louis: <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 > . New York/Evanston/London 1969, P.118 f。

织中的工人进行 1927 年的 4 月 12 日大屠杀时，共产国际还劝说共产党员和工人避免公开斗争，这本质上有利于把他们送到屠刀之下。即使在此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还继续在武汉努力维护与蒋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在论述对国民党右翼的政策时曾说，“要充分利用,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后再扔掉”。[①] 几天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几经踌躇地把蒋介石谴责为“革命的叛徒”。1927 年 4 月，蒋介石国民党右翼与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决裂了。此时，斯大林通过鲍罗廷指示中共领导，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政府，共产党人应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它。[②] 当 7 月份武汉国民党也把共产党人从队伍中清除出去之后，苏联军事顾问也只有离开中国，而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了。但斯大林却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把长期固守与国民党联盟的责任推给了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陈被当作了替罪羊，并由瞿秋白接替了总书记职务。[③]

1927 年夏，莫斯科和中共突然想在 4 个省组织武装起义，但起义都失败了。这个动议显然来自斯大林，他企图以这种方式

① 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1928 年汉堡／柏林版（1967 年米兰再版),第 124 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338 页。

③ 此段参阅 Isaacs:〈The Tragedy〉; Allen 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1953, 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科隆，1959 年,第 85—89 页；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1966 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 65—206 页；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8〉; Martin Wilbur, and How Julie Lien – ying:〈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89; 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Vol. II, Leiden/ New York/Kobenhavn/Koeln 1991；格鲁宁：《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 年)》,第 2 卷,莫斯科,1975 年；Leong Sow – Theng:〈Sino – 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 Canberra 1976 迪特·海因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第 1 卷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1924—1927 年》,帕德博恩,1979 年；Ch'en, 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P.505—526;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1927—1937〉, P.116 f. 扬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1988 年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两卷,北京，1989 年 扬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1992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中掩盖他迄今为止的中国政策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注）参与了与中共领导的有关密商。第一次武装起义于 8 月 1 日在南昌举行。接着是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 4 省的农村“秋收起义”，以及长沙的暴动。12 月在广州进行的武装暴动也失败了，共产国际代表海因兹·诺伊曼在广州暴动的策划和执行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这次暴动导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而诺伊曼则得以逃脱。尽管如此，中共领导，而不是共产国际领导，不得不在 1928 年 7 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就长期固守与国民党合作而导致失败的起义作了自我批评：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 1928 年 7—8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由共产国际严格控制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斯大林，而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领导单独承担了 1927 年下半年暴动失败的责任：他们执行了一条“盲动主义路线”。大会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冲突的阴影之下举行的。而毛泽东在此之前已因他筹划的湖南秋收起义失败受到了中共领导的批评。②

莫斯科奉行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国民党的策略失败了。1927 年 12 月，重新联合起来的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苏联的中国政策因此彻底失败。1928 年蒋介石战胜了华北的军阀，并开始在南方围剿共产党人。

①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 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P.117—121；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第 88 页及下页；Isaacs：＜The Tragedy＞，P.272—29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350 页。

②此段参阅上一段引证的参考材料，特别是 Isaacs：＜The Tragedy＞，P.272—292；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P.113—121；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第 85—89 页；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 219—237、238 页及下页；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年代》，第 31 页及下页；海因茨希：《苏联军事顾问》，第 285—287 页；Ch'en，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P.525；Ch'en，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P.83—188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388 页；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8＞P.147—169

显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该党只是在几个大城市留下了一些分散的支部，一些起义部队的残部和一些农民武装。继续听从共产国际的党领导试图在城市中重建党组织，而在湘赣山区的毛泽东则把他的农民部队与朱德的部队实现了合并，并建立起苏维埃区。在其他省份，如：湖南、湖北、安徽和福建，也出现了苏区，它们被作为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把革命扩展到城市。从共产国际建议的城市革命的失败中，毛泽东得出结论：革命只能从农村开始走向成功。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了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和当时的中共领导而自行发展的新阶段，并最终获得成功。①

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行动持怀疑态度。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与他协商一致。由于这涉及革命策略问题，莫斯科对过去的错误也进行了总结。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领导提出建议，暂时放弃进行城市暴动和农民起义，而应在苏区进行土地改革，并从那里开展游击战。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毛泽东的方案。这一建议对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产生了影响。② 自 1930 年 2 月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领导从上海批评毛泽东和朱德，说他们坚持“分散逃避”的“陈旧的思想”，要求他们把部队用于攻打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计划是一大错误。8 月，李制定了占领长沙、南昌和其他大城市的全盘计划。③ 他同时要求莫斯科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介入以示支持。当

①此段参阅：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 279 页及下页；Ch'en, Jerome: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 , P.183—198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386 页；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年代》,第 30 页及下页。

② 参见周恩来 1944 年 3 月 3 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引自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5 页及下页。

③此处和以下两句可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40 页。

共产国际拒绝了这一要求后，李指责他们违背国际主义，并威胁要中止对莫斯科的效忠。当 8—9 月占领长沙失败时，并非来自莫斯科指示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挫折。①

至此，共产国际开始直接介入中共领导的组成。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在 11 月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盘问，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受阻而不得回国。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其东方部的副主任帕维尔·米夫到中国，操纵 1931 年 1 月中共领导的改组，使一批为共产国际信任的、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中国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的反对者给这批人起了一个别名：“28 个布尔什维克’或称‘中国斯大林派”。为首的是王明(陈绍禹)。他于 20 年代中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流亡于苏联，直至 1974 年客死于莫斯科，他以忠诚于苏联路线而出名。 1932 年，王明回到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工作到 1937 年。在这一工作岗位上，他支持直至 1933 年设立在上海的党中央，力图控制各个苏区，首先是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②

1931 年以后，出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的影响有所减弱。

① 此段可参见 Richard C. Thornt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intern Strategy for China: 1928＞ in: Milohrad M. Drachkovich and Branko Lazitch (ed.):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New York 1966, P.90 ff. ; Carr: ＜Twilight＞ . P.319—28。

② 此段和下段参阅 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122—167; Charles B.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P.5—50 页 ;Hsiao Tso – li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 – 1934, Seattle 1961, P.13, 23, 125, 128, 320, 343; John E. Rue:〈Mao Tse – tung in Opposition〉. Stanford, Cal. 1969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48 页 汪其明(音):《中国共产党史稿》1965 年台北版第 2卷,特别是第 100 页 ;Richard C. Thornton:〈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 – 1931〉, Seattle/ London 1969 海因茨希:《奥托·布劳恩(李德——译者注)回忆录和毛泽东上台》第 274 – 288 页 格里戈列夫:《巴维尔·米夫(1901 – 1938 年)》,收于《著名苏联共产党人 – 中国革命的参加者》, 莫斯科,1970 年 ; 郭恒钰:《毛泽东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 1975 年帕德博恩版 ; Carr:〈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New York/Toronto 1982, P.328 – 365; Jerome Ch'e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 1937〉, P.168 – 229 扬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988 年上海出版 ;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1992 年北京出版 ; 黄修荣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

1935 年底，中共领导通过信使得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今后将不再干预中国共产党人的内部事务，而只对他们的政策进行监督。① 而这一监督，与过去一样，是为维护苏联利益，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在一年前就已被证实。当时，共产国际把日本的对华侵略行为解释为是针对苏联的，从而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②，而根本未提保护中国。

关于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此就结束了。一般说来，本章节在很大程度上着重刻画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结束并非由于共产国际在 1935 年实行了自我限制，而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共内部的、非莫斯科所能影响的发展过程。

第二节　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人：独立解放的前提

始于 1935 年的新发展,逐步导致 1945 年中共从苏联束缚下的解放。1935 年 1 月当神话般的长征正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在遵义(贵州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排除了一直听命于莫斯科的派别。这一事实可视为中共开始获得解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自 1927 年以来，毛泽东通过独立的行动得出这样的认识结论 莫斯科的指示是在对中国形势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它很难帮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各种现象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接管了军事领导，并为他上升为党的领导人奠定了基石。

在此之前，总书记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1980 年中文版第 3 卷第 296 页。
②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64 页及下页。

人奥托·布劳恩（李德、华夫）是当时党领导中的“斯大林派”头目，并同周恩来一起掌管军事。在遵义会议上，他们二人被免去了职务，并从 1936 年开始对军事决定已无实际影响。在遵义，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博古被排除出这一机构。两个月后，博古又失去了“中央负责人”或称“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的职务，这一职务由洛甫（张闻天）所接替。此时，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并最终担任了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三人军事小组”在以后的长征期间构成了军事最高司令部。毛泽东以此而取得的地位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为军事性质的问题，而党的问题退居于后。① 1935 年 10 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显然已成为三个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的最高领导人，这三个领导机构是：党的领导（由洛甫为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代表）和苏维埃政府（由博古为代表）。②

对这一发展过程，莫斯科已不能施加影响，即使要施加影响也无法实行，因为在 1934 年夏末或秋季莫斯科与中共领导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它直到 1936 年年中才重新恢复。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发展事实，并把遵义会议作为摆脱莫斯科束缚和走向解放的重大突破而加以庆贺。“会议

①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细节以及此后高层领导中的发展，在研究界至今仍有某些争议。此段参阅《中国共产党创业 30 年》第 313 页及下页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45－152 页 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 （1932－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131－149 页，207 页及下页；Ch'en, Jerome: < 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TCQ, 40, 1969, P.1－38 ；迪特·海因茨希：《奥托·布劳恩与遵义会议》，载于 TCQ，第 42 期 ，1970 年。

②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207 页及下页。

③关于无线电中断的时间， Michael Sheng 提出是 1934 年的 8 月，黄修荣提出的是 10 月，奥托·布劳恩则认为在 9 月底以后。见 Michael Sheng: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51 f；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48 页；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111 页。

召开之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它自己的、符合本国条件的道路。……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① 关于毛泽东在遵义赢得权力的这一事实是如何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接受的，这在研究界是有争议的，并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证明。② 不过，有许多迹象表明，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的王明和康生对此是不满意的。③

1936 年夏，毛泽东明显地表露出新的对莫斯科的自我意识：

在苏联是共产党掌权，即使在那里，第三国际也不实行统治，对人民根本没有权力。同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但根本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我们为争取中国解放而进行斗争，当然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交给莫斯科。④

1937 年底，王明搭乘第一架在延安降落的苏联飞机回到了中国。在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极力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从而在一些专门问题上取得了对毛泽东的胜利，至少是形式上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同国民党进行抗日的紧密合作，而毛泽东曾对此持拒绝的态度。1935 – 1943 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乔治·季米特洛夫曾试图劝阻王明不要谋求正由洛甫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有迹象表明，王明仍为此作了努

① 《中国共产党创业 30 年》，第 314 页。类似的评价可见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48 页。

② 参阅 Garver 和 Sheng 之间的争论，见 TCQ 第 113 期，1988 年，第 37 页及下页；TCQ 第 129 期，1992 年，第 15 页及下页，178 页及下页。

③ 参见 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TCQ，113，1988，P.38

④ 毛泽东于 1936 年 7 月 23 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9，P.419. 这一谈话没有收入北京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但没有成功。这个职务被撤除了。①

另一个影响莫斯科和中共领导关系的情况是：王明在 12 月会议上坚持要求中国党的领导也应像斯大林在苏联那样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并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1929 年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前领导人陈独秀的重新入党申请，不管陈独秀是否真的是一个日本特务，但他如果被重新吸收，斯大林将会得知，这将导致“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党领导虽然作出决定，拒绝陈独秀的请求，但鉴于王明狂热地坚持实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措施，许多领导成员显然对此感到不舒服。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他曾赞成重新吸收陈独秀，并曾在私人谈话中说过，斯大林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在新疆，王明对五名党的老干部进行了迫害，并处死。张国焘因与他们有过密切合作，并感到有压力，因此于 1938 年 4 月离开了党。不管王明对陈独秀的攻击是否是针对毛泽东的，但张国焘这位曾是毛泽东的重要反对者的出走，这是毛泽东在通往最高领导者的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胜利。②

1938 年夏季和秋季，王明不顾延安指示，推行保卫武汉的战略并遭到失败，而毛泽东的战略却使北方共产党的根据地得以巩固。此时，王明这颗明星开始坠落了。对此，莫斯科也不能视而不见。此外，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任弼时，于那年的春天

① 此段参阅 Thomas Kampen: <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 . In: TCQ.117, 1989, P.131 ;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P.11 – 13, 64 – 67；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440 页及下页，第 454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 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18 – 425 页；Kuo: < Analytical History > , Vol.III, P.336 – 341; 《中国共产党创业 30 年》，第 375 页。此段还参阅 Frederick C.Teiw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SOAS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Research Notes & Studies Series, No.10, London 1994。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1980 年中文版第 3 卷第 424 – 432 页；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P.67 – 70

成功地说服了季米特洛夫，应把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领袖。7月6日，《真理报》第一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并把他说成是“中华共和国特区政府主席”。[①] 1938年8月，季米特洛夫公开对任弼时和王稼祥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与王明拉开了距离。[②]

1938年9至11月期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进一步战胜了王明，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击溃。此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妥协。毛泽东，至少在形式上，顺从了来自莫斯科的、关于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压力，并承认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莫斯科方面，同样也至少在形式上，承认毛泽东在与国民党结盟方面保持中共独立性的要求，批准毛泽东为扩大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农村进行“持久战”的策略，尽管这将会导致与国民党关系的紧张。此时，莫斯科已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地位。[③]

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与共产国际争论之后，毛泽东开始反击忠于莫斯科的、围绕在王明和博古周围的批评者，他们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把他们贬低为“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④] 1941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激烈争论中最终把代表莫斯科路线的王明挤入墙角。[⑤] 据说，王明被迫背

① 《真理报》1938年7月6日，第184（7509）期，第4版。

②周恩来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至少到1940年为止仍信任王明，或者说与他保持着良好关系，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414页。

③参见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New York/Oxford 1988，P.74－79，及有关引文来源；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455－458页、460页、和468页及下页；汪明：《中共50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年出版。

④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361页及下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第236页。

⑤详见本章第9节。

着毛泽东，通过苏联驻延安代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与莫斯科联系。[①] 数年后，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由于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而出现的形势时，谈到了莫斯科和中共关系中的三个主要冲突。[②] 毛泽东说，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

1942 年至 1944 年毛泽东在康生的帮助下，在延安组织了“整风运动”，所有党员都被迫表示对他本人及其“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的忠诚。显然，这次宣传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排除王明的追随者。按苏联行话，他们被称为“国际主义者”，而毛泽东则把他们贬称为“莫斯科集团”。那些曾在苏联停留过的党员被贬低为“教条主义者”，有时也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者”。1943 年 12 月，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季米特洛夫，指责中共领导错误对待“莫斯科集团”的成员，他具体提到周恩来和王明的名字，并批评了康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③] 毛泽东的这场运动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气氛。正如其他共产党执政国家所常见的那样，人们利用了心理恐怖的方法。无数的党员受到了荒谬的指责，被迫进行自我指控和告密。相当多的人被捕，被长年监禁，有些人甚至自杀。王明在政治上遭冷遇，但显然出于对莫斯科的顾忌，他仍然被继续留在中央委

①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第 257 页。

②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见《党的文献》 199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③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 22 日给毛泽东的信。引自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 414 页；并可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第 296 页。

员会里。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撰学中，人们承认康生曾搞过逼供，但同时认为这种方法是他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学来的。此外人们还指出，在季米特洛夫提出批评时，毛泽东和党领导早已纠正了这种“错误”。②

“整风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彻底战胜了他的对手。1943 年 6 月 8 日共产国际解散，这也有助于毛泽东清除“莫斯科集团”。当延安得知此消息时，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其满意的心情。③

毛泽东在清除“莫斯科集团”方面进行得很巧妙，他在逐步孤立亲苏政敌的同时，利用各种合适的机会以非常高的调门赞扬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1943 年 3 月 20 日，他在形式上接任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职务。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 年 4 月至 6 月）最终完成了这一发展：毛泽东于 1945 年 6 月 19 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就开始了。党代表大会前夕，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一项经过修改的党史描述具有了权威性，它肯定了毛泽东

① 此段参见 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 – 1944〉,Seattle 1966;Dai Qing, Wang Shiwei and White Lilies: <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 – 1944 > . Armonk, N.Y.1994; Gregor Benton and Allan Hunter (Eds.): < Wild Lily, Prairie Fire.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 1942 – 1944 >,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 P.7 – 13, 69 – 84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特别是第 147 页及下页，233, 343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362 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242 – 247，并附有引文出处；Klein/Clark:《人物辞典》第 1 卷第 233 页;王明：《中共 50 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 年版，第 70 – 75 页；Byron and Robert Pack: <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ew York/London/Toronto/Tokyo/Sidney/Singapore 1992, P.172 – 175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 – 2 月）》,载于《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4 页。并可参见本章第 3 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② 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414 页。

③ 详见本章第 9 节。

的圣徒般的事迹，并对党内的著名反对派，如陈独秀、李立三和张国焘，进行了清算。由于考虑到与莫斯科的关系，王明的名字没有被点出。从编撰历史的质量角度看，该决议可以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媲美，很可能也作了仿效。①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莫斯科的挑战

整风运动最后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毛泽东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的运用。但这同时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的挑战，因为苏联领导人自认为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无论在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球方面都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与中国和亚洲处于世界中心的思想紧密相联系的。1936 年夏毛泽东已通过暗示方式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毛泽东首次认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②

1937 年下半年，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社会条

① 此段参见 Thomas Kampen: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In: TCQ.117, 1989, P.118－134, spec.P.132 ；王明：《中共 50 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 年版，第 49－56 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中文版 1991 年第 2 版，第 952－1003 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 年莫斯科出版。

② 毛泽东于 1936 年 7 月 23 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374。此段和下一段还可参见 Raymond F.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 1980。

件下，毛泽东开始发展其哲学基础。①1938 年 10 月他在第六次中央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表述，但显然考虑到莫斯科，而没有把它写进决议。毛泽东以这一表述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特殊形式：

>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此外，毛泽东也有意以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奠定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应偏离以维护苏联利益为主的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而应把中国的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③

1940 年 1 月毛泽东明确地离开了“苏联的道路”。“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构成了国家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还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提高为“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要采取的形式。诚然，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最低纲领，只适用于“现在”；在将来，则是实现“社会主义”，

① 此段参见 Garver: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P.79 f.; Stuart Schram: <Mao Tse – tung. 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Hongkong 1983, P.37

② 引自 Minoru Takeuchi:《毛泽东记》，1970 年东京版第 6 卷第 261 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用语，在北京官方出版物中被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1991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534 页另可参阅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9, P.112, 171 – 175

③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53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